# 疫情暴露出哪些社会问题？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9104604

|  |  |  |
| --- | --- | --- |
| 好问题数 | 评论数 | 答案数 |
|  |  | 8 |

## 热门回答

### 回答1

点赞数318

评论数76

内容：  
<p>一场空前疫情，对中国社会是一场强烈的冲击，也构成一次深刻的暴露，在这场空前的大灾大难面前，我们的社会既展示出了它好的一面，也暴露出诸多糟糕的问题。</p><p>一、“好”的方面：令人欣慰与鼓舞的表现</p><p>一是强大的应急应变能力</p><p>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全国上下迅速进入战时状态。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战时，但谁都知道，此次疫情对中国的冲击堪比一场战争。笔者甚至冥想，即便爆发大规模战争，比如南中国，或者台湾海峡发生战斗，对13亿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恐怕都没有这次疫情严重。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冲击着每个中国人和每个中国家庭的生活，使得他们不得不大幅度地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存在状态，所以，形容疫情之下全中国进入战时状态，并不为过。</p><p>发生如此急速的转变，社会秩序与民众心理都有一个能否承受的严峻问题。很多脆弱的社会面对类似的危机将很难适应，可能会酿成大面积的骚乱，比如抢购风潮、群体性事件等，但是，我们中国社会总体而言却波澜而不惊，适应突变的表现是既急遽又平稳。各级政府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迅速激发调动起来，开始卓有成效的行动，社会秩序和大众心态做出了良好的适应与配合，上下同欲，官民一致，国家整体上表现出了强大应急与应变能力。</p><p>二是强大的贯彻执行能力</p><p>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是一层又一层的层级社会，平常生活中我们见惯这这种层级社会层层传达、层层贯彻，结果往往层层折扣、层层放水的现象。这曾经是众多公知们所诟病与攻讦的焦点，也曾是海外许多人断言“中国即将崩溃”的依凭，也是我们经常为之痛心的体制与机制弊端。如果仅仅从这个侧面出发，那么许多人都难免要得出这样悲观的结论：中国的官僚体系没有希望，中国社会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没有希望。</p><p>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危机面前，中国社会的组织动员和贯彻执行能力迅速被唤醒激发，中央一声令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都无条件地行动了起来，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羼水分，仅以小时为计，就能把最高决策和部署贯彻落实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最底层。任何人只要看看网络上所展示的村里、乡里、社区里那些鲜活动人的标语口号，难道只是“逗人”、“有趣”那么简单吗？这样的执行力，让人仿佛想起了共产党打游击、闹革命时期的光景，也让人恍然有种回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感觉，这些表现在深层次上证明，共产党统治的执行力依然十分地坚挺。</p><p>三是强烈爱国心凝聚力</p><p>大灾大难面前，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思想精神与文化情感高度统一、高度凝聚。除极少数人幸灾乐祸、冷嘲热讽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管身在何处，全都心系祖国，全都愿意为抗灾救难贡献力量。社会公众的正义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决，使命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旺盛。谈到奔赴武汉灾区救援，朋友同事间私下里掏心窝的话都这样表示，只要国家需要，那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p><p>任何秉承客观公正立场的人都看到，在巨大灾难面前，中国人民没有退缩，相反却激发出来空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这意味着，任何危机面前中国人都不会松散溃退，反而要变得更加团结坚强，这一点，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p><p>二、“坏”的方面：令人沮丧和愤慨的问题</p><p>一是中国并未摆脱危机的魔掌</p><p>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走在“强起来”的道路上，但汹涌而至的疫情告诉我们，中国的安全保障在许多方面还有惊人的缺位与漏洞，一旦被攻击就有可能酿成大灾难，无论这种攻击来自于自然抑或人为。为此，我们还必须在今后把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应对抗击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此次新冠疫情可以战胜也必须战胜，但在此之后其它危机的魔掌还必将伸向我们，这不是我们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痛苦的现实，任何时候都不可高枕无忧。</p><p>二是有人借机发“国难财”</p><p>从口罩到白菜，有人利用抗击疫情全国进入战时状态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借机大发横财。有人说这是资本的本性，也有人还要为这种发财方式辩护。但不管怎样，借机哄抬物价发财就是在发国难财，这没有什么争议。对比大量的捐助，发“国难财”行为该有多么缺德，相信任何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完全明白。有人说这并不违法，但要知道的是，“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貌岸然的资本操盘者们如果连内在道德底线都缺失了，那还有什么资格谈论法律。</p><p>三是一些干部尸位素餐、颟顸无能</p><p>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的干部队伍也是这样，轰轰烈烈的抗疫行动暴露出一些干部的丑陋本相，他们实在是太无能、太麻木了。但这不是关键，关键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干部的丑陋表演严重败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可以这样说，在抗疫行动中，一方面是党和政府殚精竭虑，广大党员奋勇争先，而另一方面则是个别党员干部在抹黑败坏，呈现出正与反、光明与黑暗两种倾向鲜明对比与映照的空前奇观。</p><p>当然，上述总结归纳注定肤浅偏颇，但“好”的方面已充分代表和体现了当代中国的优势方面，这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性优势，更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特有的优势，这些优势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也足以形成强大的震撼与震慑，使未来任何危机在中国面前都难以避免战略上的渺小与破产，中国具有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危机的强大力量；与此同时，“坏”的方面也足以证明，当代中国还存在相当阴暗的成分，还有相当多的毛孔正在欢快地流淌着十分肮脏的血，令人痛心，令人愤慨。</p><p>将疫情之下“好”与“坏”的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比对品鉴，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认知，将在中国再次引发有关主义与制度的反思和争论，也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与危机应对提出更深层次的课题，并相应地对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做一定程度的修正，以纠正那些历史的偏颇与失误。</p><p>正所谓不吃一堑不长一智。中国人经历新冠病毒肆虐之堑，由此看清了许多人和许多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国际社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对手，谁是我们的敌人，此时此刻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地区分出“好”与“坏”了。</p><p class="ztext-empty-paragraph"><br/></p><p>举报/反馈</p><p></p>

### 回答2

点赞数10

评论数76

内容：  
<h2><i><b>“风险的社会放大”</b></i></h2><p><b> 一、</b> <b>新闻发言人行为表现未能满足公众对风险沟通者的角色期待</b></p><p><b>疫情新闻发布</b>过程中，少数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低头念稿、在回应记者提问时答非所问、以套话方式进行疫情通报等行为表现，因未能满足公众对风险沟通者的角色期待而引发质疑。<b>比如，</b>在疫情新闻发布环节全程低头念稿，难免会给公众留下疫情信息掌握不充分的印象，并进一步引发对风险管理者的能力质疑。<b>以湖北省为例，截至2月7日共举办肺炎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17场，每场均存在新闻发言人低头念稿的现象。</b><u>相反，2月3日央视《新闻1＋1》节目中，温州市长姚高员在接受提问时，全程脱稿回答，叙述条理清晰，数据引用准确详实，受到一致好评。</u><b>风险沟通者所呈现的能力，以及留给公众的印象，是影响风险沟通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b>一个专业素养不高的风险沟通者，会让公众产生风险管理者是否称职的疑虑，进而导致从风险认知框架的搭建到风险措施的施行的全面溃败。</p><p><b>二、</b> <b>疫情信息供给未能满足公众对风险信息的特殊需求</b></p><p><b>（1）疫情信息供给方面不统一</b></p><p>这次疫情新闻发布的初期，<b>疫情信息供给</b>方面所存在<b>发布口径不统一</b>、<b>事实表述不清</b>等问题，<b>使部分公众在寻求疫情信息过程中产生认知困惑</b>，进而在进行责任归因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当归因，由此对疫情新闻发布的风险沟通效果产生<b>负面影响</b>。</p><p><b>（2）发布口径方面不统一</b></p><p>尽管新冠病毒的研究本身具有渐进性，公众也对相关研究进展的修正具有一定认识与合理期待，但考虑到疫情期间的<b>公众心理与精神状况对风险沟通效果的潜在影响</b>，在疫情新闻发布中，这种渐进性应当被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统一的疫情信息发布口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b>根本手段</b>，它为公众构建了关于疫情的相对清晰稳定的认知框架，并为公众实行风险应对举措提供了<b>心理基础</b>。<u>倘若在疫情新闻发布工作中不能够做到统一口径，公众关于疫情的风险认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不完整的，甚至出现错误的信息接受与概念认知。</u></p><p><b>三、</b> <b>疫情新闻发布中表达的情感与价值观未能与社会主流充分契合</b></p><p>疫情期间<b>“秩序需求”</b>的心理补偿机制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于<u>经历突发公共事件的民众会更多地关注和思考与价值观有关的社会和人生问题，并且有强烈的意愿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u>。“<b>价值观</b>是人们判断事物的是非、好坏、美丑和意义的信念系统，关系到人们对于人生目标、社会准则、理想信念等重要问题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在此意义上，<b>价值观是支持人们社会秩序感知的一杆无形的标尺，符合内心价值判断的事物能够给人以秩序性的慰藉和支撑</b>。”然而，在疫情新闻发布过程中，一些风险沟通者在告知公众事实的同时，未能在情感与价值观层面与公众形成共鸣，降低了疫情新闻发布的传播效果，<b>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由疫情防控措施引发的热点事件舆情回应中</b>。</p><blockquote><b>张志安,冉桢.“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下危机事件的风险沟通研究——以新冠疫情中的zf新闻发布为例[J].新闻界,2020(06):12-19.</b></blockquote>